

张岱年全集

— 增订版 —

天人五论

张岱年 著



中华书局

张岱年全集

— 增订版 —

天人五论

張岱年 著

哲學家須有求一致於客觀真理之誠心，即須充公的秉
配，考量以其他哲學家的見解，或依他家的方法試思一決
細細考量他家所得的結果的品值。我視他家的學
其哲學家之資格。

任何哲學學說如非集思，都必有所是，對於
其論，亦應完全排斥之，而亦應容納其對的成
否納之，更須提高之。對於任何哲學，都應且揚
且且振振且振振，且吸納且歸蕩。

任何哲學家的工作，都不至於是完全排斥，有是是
其錯誤中的正確，實應辨無而吸取之。在哲學的戰鬥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人五论/张岱年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7.5
(张岱年全集/增订版)
ISBN 978-7-101-12059-2

I.天… II.张… III.哲学理论-研究 IV.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5389 号

书 名	天人五论
著 者	张岱年
丛 书 名	张岱年全集(增订版)
责任编辑	邹 旭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9 ³ / ₈ 插页 2 字数 214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059-2
定 价	46.00 元



张岱年先生摄于1946年

事理论自序

七七事变後，余發憤振作，不與世接，日惟取中西古今哲學典籍讀之，專務深沈之思，擬心窮究大義，有得輒記之，三四年間，居然成帙，適于民國三十一年春，整理成篇。惟生事頗著，躬投榮水之勞，著作之業，時作時輟，迄于抗戰勝利，僅成哲學思想

同德增

論、事理論、知實論、品德論共四編，其中哲學思想論、知實論、品德論，皆得從前惘惘，惟事理論，則具首尾。亂世治學，亦不難矣。民初以來，時賢論學，于紹述西哲之餘，亦兼明中國性質，于程朱陸王、習齋、東原之學，時有闡發，學人之中，述顧戴之指者，余陸王之說者，皆程朱之說者，皆已有人。而此編所談，則以根據象山之旨為最近，于西方則兼取唯物論與新哲學之說，庶幾立異于時賢，不致自違

其所信守。今抗戰勝利，大地重光，不內戰方要，學術難言，故錄存篋中，聊備他日稽覽云爾。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 張岱年 于清華園

《天人五论》之《事理论》自序手迹

《张岱年全集》(增订版)出版说明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原籍河北省献县(今属沧州市),生于北京。父张濂,为光绪朝进士、翰林院编修;兄张崧年(张申府),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同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30年代中期,撰写完成重要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大纲》。抗战期间滞留北平,1943年秋起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1946年重返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年起担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等职务。

张岱年先生曾对自己的哲学研究做以概括总结:“我的学术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一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文化问题的探讨。”(《平生学术宗旨》)张先生注重阐释中国哲学史传统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及人本精神,并首倡关于中

国哲学范畴与价值观的考察,其《中国哲学大纲》以哲学问题为纲,“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力图展示中国传统哲学之理论体系;在哲学问题的探索上,张先生将现代唯物论及逻辑分析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精粹结合,建立起自己“综合创新”的独特哲学体系,撰写于1942至1948年间的《天人五论》标志着这一体系的基本形成,并在日后不断深化发展;在文化问题上,张先生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见解,既反对全盘西化,亦不赞同国粹主义,其所谓“综合”,既包括中西文化之综合,也包括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并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基础。张先生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典范性、奠基性、开创性贡献为学界所公认,为后人留下众多宝贵的思想资源。

张岱年先生著述宏富,出版的专著及论文集主要有《中国哲学大纲》、《天人五论》(收于《真与善的探索》)、《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求真集》、《中国哲学发微》、《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思想·文化·道德》、《文化论》、《晚思集》等。清华大学出版社曾于1989至1995年陆续出版《张岱年文集》六卷本,而后河北人民出版社又于1996年出版《张岱年全集》八卷本,惜因当时种种条件所限,《文集》、《全集》对张先生作品收录未周,尚有遗珠之憾。2014年,经张先生家属的授权与协助,我们开始对张岱年先生著作重新进行全面的收集

整理,计划用几年时间分批出版《张岱年全集》(增订版),以冀形成张先生全部著作的一个完整版本。

现将增订版《全集》编辑过程中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介绍如下:

1.增补。

增订版《全集》在《文集》、《全集》的基础上,通过家属提供和社会征集,将整理收录张先生大量未曾面世的手稿,包括学术论文(以1949年以前及晚年为主)、随笔札记、授课讲义、书信、日记、译著等,以及若干已发表而原版《全集》未收的作品。

2.新编。

增订版《全集》大体上分为专著、论文、杂著三大类。其中,论文部分以张先生自编之诸选集为纲,而将相应年代的零篇文章附于其中,如张先生有《求真集》,专收早年论著,则将1949年之前学术论文均附入此集中,而以“求真集新编”为书名。各类杂著亦依内容及体裁重新分类编排,其中札记手稿数量尤夥,且多以零篇残句形式保存,我们在家属协助下加以编选,与原《研思札记》等合并成集。

3.校勘。

增订版《全集》以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全集》为工作本,搜集众本详加比勘,并充分利用现存手稿及誊清稿对校,复核引文,斟酌审定,必要之处出校记说明。以呈现张先生著作原貌为基本原则,尊重作者用语习惯,除明显的排印错误及引文问题外,不妄加改动。引文出处标注格式亦在各书内部予以统一。

4.编制索引。

为便于读者查找,各卷均编制人名、书篇名索引。

《全集》中各著作版本情况及内容体例不一,整理时根据各书具体情况酌情处理,敬请参阅各卷前《编校说明》。

在增订版《全集》编辑过程中,张尊超、刘黄二位先生亲力亲为,整理张先生未刊遗稿,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信任及大力支持;同时我们也有幸得到了陈来、杜运辉、李存山、刘笑敢、衷尔钜等诸位先生的中肯建议,以及学术界、出版界众多朋友的支持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限于水平,书中或有疏漏失考及编排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6年7月

本卷编校说明

《天人五论》由《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五篇组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陆续写就。1988年由齐鲁书社首次出版,与同时期学术札记《宇宙观与人生观》、《认识、实在、理想》等共同收入《真与善的探索》一书,后收入《张岱年文集》第三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张岱年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本次出版,因《天人五论》可视为一个整体,集中体现了张先生形成于四十年代之“综合创新”的“新唯物论”哲学体系,故作为专著单行,原附的两组学术札记另行编册。张先生1944年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时名《哲学方法论》、《知觉与外界》、《变化与规律》)作《近三年来所写三稿之说明》,今录于书前以代序。《真与善的探索》作者自序虽非专为《天人五论》而作,但详细叙述了撰写“五论”期间的学思历程,故亦收录于此。

2 天人五论

编校中以《全集》本为工作本,据《真与善的探索》一书进行校勘,并以张先生家属提供的 1953 年秋誊清稿对校,订正历次排印中的文字标点讹误,并核对引文,统一体例。部分词句缺漏致使文意不全之处据誊清稿补定,并以脚注说明。书后附人名、书篇名索引,以便读者查阅。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6 年 7 月

近三年来所写三稿之说明

1. 哲学方法论 共六章 五万字

内容主要讨论哲学之性质,哲学命题之性质,辩证法之性质,及辩证法之主要规律等问题。惟文字过于简约,甚不通俗。将来拟另写一比较通俗的专讲辩证法的书。

2. 知觉与外界 共四章 三万字

系提出一个对于外界实在之新证明。论证较详,文字亦不通俗。

3. 变化与规律 共九章 八万字

此稿仅抄出前四章,后五章仅有草稿,尚未誊清。

此稿原名“事理论”,因原名太不通俗,今改为“变化与规律”,内容系讨论宇宙哲学之基本问题,主要系讨论事物、变化、关联、性质、规律、可能、必然、因果、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等问题。

1944 年

《真与善的探索》自序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我对于哲学问题深感兴趣,当时除撰写《中国哲学大纲》之外,又撰写哲学论稿若干篇。以为中国古代确有唯物论传统,又富于辩证思维,意图将中国古典唯物论与现代唯物论,将中国古典辩证法与现代科学辩证法结合起来,采取民族的形式,而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出之。而内容颇异于时论,故未遑问世。五十年代以来,专力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对于哲学问题存而不论。荏苒三十多年,进入八十年代,又感研究哲学史,如果对于哲学理论问题毫无自己的见解,恐亦难于体会往昔哲人的深湛义蕴,于是又有意于钻研理论问题。近年以来,二三知友每以个人思想变迁之迹见询,于是取出旧稿,略加省览。旧稿多属臆说,颇多违俗之谈,然而方之前辈熊十力先生等自成体系诸家,似亦别其一格,于是略加审订,编为一集。昔日撰稿之时正值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今则躬逢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光辉之时,追忆昔日之忧患,益感今时之幸福。旧稿写于四十

年前,盖多偏失,不过保留昔日哲学园地中一隅之痕迹而已。近几年来,考虑哲学问题,亦有所体会,当更撰新论。

以上系 1981 年 2 月所写。当时曾编次旧作,撰写序言及各篇“附记”。及今观之,仍觉意有未尽,于是更略述原委。

吾昔少时,好作“深沉之思”,不自量力,拟穷究“天人之故”。思考哲学问题,常至废寝忘食。1942 年至 1944 年间,将平日致思所得整理成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等论稿,1948 年又写成《天人简论》。《哲学思维论》论述哲学的性质、哲学命题的意义以及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知实论》从感觉经验推证客观世界的实在性。《事理论》论述事物与规律的关系。《品德论》论述价值的标准与道德理想的基本准则。《天人简论》则综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论稿,经过四十多年,幸未毁弃。现在连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思想札记《宇宙观与人生观》、《认识、实在、理想》汇为一编,藉以存留我四十岁前学术思想的历史足迹。因各篇内容主要是探索真理与至善的问题,故题为《真与善的探索》。

忆三十年代初期,读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四十年代之初,读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与金岳霖先生的《论道》,深佩诸先生好学深思、各自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然而犹未履足,亦想提出自己对于哲学问题之所见。于是写出这些关于哲学问题的论稿。我与诸先生不同之处在于我比较推崇唯物论、赞扬辩证法。但是我又没有遵守比较流行的唯物论的表达形式,因而久久未敢问世。这些论稿可以说是四十年代在哲学园地中一个理论探索者寻求真理的思想记录。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三十年代的问题,论证的方式也是三十年代的方式,其所关涉的西方哲学思想

也是三十年代的西方哲学思想,同时更表现了三十年代的文风。当时著论,直抒胸臆,无所畏惧,譬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驰骋独立思考,近乎“洸洋自恣”。论稿中所讨论的问题与所提出的见解,在今天看来,可能都显得非常奇特;如果联系三十年代思想界的情况来看,或者不至于感到诧异了。

这些论稿的基本倾向是企图运用所谓“逻辑分析”方法来阐明、论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这在很多人看来都会感到是一个奇怪的设想。我当时肯定客观世界独立存在,肯定物质存在是生命、意识的基础,感觉经验是思想观念的来源,总之肯定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同时认为西方新实在论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有其可取之处,可以用来阐明唯物论的基本命题。当时更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所具有的民族形式亦可选择继承,如“事理”、“道器”、“体用”、“心物”、“天人”等范畴仍可采用。这些论稿在形式上不守通常的矩矱,在内容则力求符合于客观实际。至于见解失误之处,自然是在所难免的。

我在三十年代初期发表的一些有关哲学问题的论文,如《论外界的实在》、《谭理》、《论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其主要观点与这些论稿是一致的。(《论外界的实在》、《谭理》已收入《求真集》,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里,我当略述我四十岁前思想演变的过程。我初习哲学,从研读先秦诸子入门,青年时期,特好《老》、《庄》,同时广泛阅读西方哲学著作。三十年代之初,受吾兄申府(崧年)之引导,阅读英国新实在论者罗素(B. Russell)、穆尔(G. E. Moore)、怀特海(A. N. Whitehead)、博若德(C. D. Broad)等的著作,对于逻辑分析

方法甚感兴趣。不久又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的中英译本,深佩其广大精湛。1936年在清华大学讲授“哲学概论”课程,广泛讲述了近代西方哲学学说,对于辩证唯物论特加赞扬。当时肯定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又承认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亦有可取之处;同时认为中国哲学中唯物论学说与辩证法思想亦有较高价值,应该发掘继承。当时年少狂放,企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以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构造一个“三结合”的体系。1936年友人孙道升发表《当代中国哲学界的解剖》一文,把我的哲学思想称为“分析的唯物论”。以上是我四十岁前思想的概貌。1949年建国以来,我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了以前没有读过的《自然辩证法》、《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书,体会较深,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的革命变革,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不复措意,专力从事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特别注意中国古代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探讨。如此度过了三十年的时间。1979年以来,重新考虑世界哲学发展的形势,觉得对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似亦不宜一概排斥,似应加以分析抉择。但对于西方流行的反理性主义则颇以为非。我认为唯物主义承认客观实在,理性主义承认理性的重要,还都是应该肯定的。

今天,我主要坚持三点:第一,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以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讲辩证法的三规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讲的“辩证法的要素”十六条,都是必须肯定的真理。第二,对于中国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优秀传统,特如王船山(夫之)的哲学遗产,应深入研究、继承发扬。第三,对于现代西方各流派的哲学思想,亦应加以考察分析,注意

摄取其中符合科学精神的观点与方法。我认为,这三点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追求真理的过程尚未终止,哲学的发展仍需要新的探索。我虽已届耄耋之年,仍愿意继续努力前进。

承蒙齐鲁书社的雅意,将此书纳入出版规划,使此书得以问世,谨向齐鲁书社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7年4月,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